

高等教育系列教材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郑国民 阎 苹 编著
刘永康 陈元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郑国民,阎苹,刘永康,陈元晖编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5

ISBN 7-5043-3590-8

I. 中… II. ①郑…②阎…③刘…④陈… III.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IV. G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700 号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编 著	郑国民 阎苹 刘永康 陈元晖
责任编辑	贺 明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72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590-8/G·13
定 价	17.80 元

主要作者简介

郑国民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专家

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北师大版《语文》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

阎 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刘永康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元晖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副教

授

编审说明

2001年6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2001年7月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及其实施,2003年4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颁布,意味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全面启动。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于高等师范院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工作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的培养如何适应现实需要已成为极其迫切的大问题。事实上原来出版的语文教育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已很难适应教学实际需要,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的理解、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此,我们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专家教授,精心编写了这本《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教材。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首先应该了解本学科的历史演变、最新动态,掌握基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此,本书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突出学术性,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新时期中学语文教育课程研究和实践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本书对语文课程性质、特点、目标、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语文素养做了专章论述。在探讨这些基本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作者坚持在试图辨析各家言说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的基本原则。此外,为了借鉴、比较国外母语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情况,本书还介绍了英、美、日三国语文教育的现状与特点。

丰富生动、灿烂多姿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文教育流弊甚多,不尽人意,需要不断地探索改革。语文教育的复杂性、艰巨性、重

要性比其他学科课程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就意味着任何人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都很渺小、力不从心。当然,本书也不例外。

经审定,本书可用作师范院校“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用书。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从基本思路、体系架构,乃至各章的一些基本观点均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讨论和修改。本书主要由郑国民、阎苹、刘永康、陈元晖共同编写而成。各章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龙军、郑国民),第二章(王玲、朱玲、阎苹),第三章(季雪娟、郑国民),第四章(龙剑明、郑国民),第五章(康伟平、郑国民),第六章(刘永康),第七章(陈元晖),第八章(祝丹兰、阎苹),第九章(石磊、胡娟、秦改英),第十章(王香平、阎苹),第十一章(孟灵峰、阎苹)。阎苹负责第二、八、九、十、十一章的修改、统稿,郑国民做了全书统稿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国内许多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不断修订完善。

高等教育系列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2004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语文教育的历史发展.....	(1)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育.....	(1)
第二节 现代语文教育	(11)
第二章 语文课程的特点	(20)
第一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	(20)
第二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演变	(35)
第三章 语文素养	(47)
第一节 语文素养的产生	(47)
第二节 语文素养的内涵	(53)
第三节 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59)
第四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	(67)
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含义与功能	(67)
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基本取向	(73)
第三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确定	(75)
第四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表述	(81)
第五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85)
第一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	(85)
第二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发展.....	(101)
第三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14)
第六章 阅读教学.....	(132)
第一节 阅读教学理论的发展.....	(132)
第二节 阅读教学设计.....	(159)
第七章 写作教学.....	(181)
第一节 写作教学理论的发展.....	(181)

第二节	写作教学设计	(197)
第八章	口语交际教学	(210)
第一节	听说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	(210)
第二节	口语交际教学设计	(220)
第九章	语文教学方式	(232)
第一节	语文教学方式的变迁	(232)
第二节	语文综合性学习	(261)
第三节	语文研究性学习	(277)
第十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	(290)
第一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的目的	(290)
第二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的方式	(294)
第三节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发展	(305)
第十一章	外国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	(314)
第一节	英国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	(314)
第二节	美国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	(326)
第三节	日本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	(339)

第一章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育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源远流长,从现有文献考证来看,单从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文字习刻算起,就至少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了。汉语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无论是在传承中华文明还是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我国传统语文教学内容庞杂,包罗万象,长期以来一身而兼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哲学、文化等教育的多重任务,以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史主要就是中国语文的教育发展史,所以当我们今天用现代语文学科的理念来诠释古代语文教学时,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这里主要针对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从中总结规律和经验。

一、古代识字教学

儿童入学,首先需要识字,然后才能独立地进行阅读与写作等语文活动,这是从古至今语文教育的一般经验。从历史上看,我国文字早在距今 3700 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非常成熟,现在已经能够辨认的甲骨文字,单字数就达 4600 多个。这些甲骨文字完全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等结构和使用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早期识字教学的状况。建国后人们发现出土的一块殷商甲骨上有五行字,重复刻着从甲子到癸酉十个干支,

其中一行刻得整齐精美，其余几行则很不协调。郭沫若先生据此推断认为那些工整的书契是“为人师范者从傍捉刀助之”^①，这成为商代文字教学的物证，展示了当时文字教学的情形。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的笔画、间架、部首纷繁复杂，难以认读，因此让多大年龄的孩子在蒙学阶段认读多少汉字就成为古代识字教学的首要问题。一般认为，古代儿童多在七八岁入学，但实际上儿童识字的年龄可能更早。清人李新庵认为子弟四五岁就可以认读汉字（《训学良规》），而唐彪在其所著《父师善诱法》中则提倡生徒至三四岁即可发蒙认字。他们都认为儿童在此时已经“口角清楚，知识稍开”，完全具备了认字的能力。在儿童识字数目多少的问题上，历来蒙学家们的看法都略有分歧，例如，唐彪曾说“令其子每日识十字，或三五字”“一年可识一二千，然后从师入塾”，可见他认为儿童在短短的一年内至少应该认识一二千字。而《训学良规》则要求到达“多则三千，少则二千”的水平。后来王筠总结了诸家的经验，认为“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教童子法》），这大体上符合古代识字教学的一般情况。

要想让儿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认读 2000 多个复杂汉字，没有优秀的识字教材显然是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汉字的认读教学被予以特别重视，有时政府还会以政令的形式颁布统一的识字课本。例如，秦统一六国之后，为了改变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相互之间很难交流的状况，实行“书同文”的政策，即用秦国通行的小篆来代替原六国的多种字体，统一文字。文字统一之后，据说秦始皇曾亲自下令丞相李斯仿前代的《史籀篇》，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识字教材。汉代类似的识字教材则更多，比较著名的有《急就篇》《劝学篇》《凡将篇》《训纂篇》等。尤其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不仅标志着这一时期汉字教学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序》，《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三卷，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也对以后的识字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后来的识字教学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探索,识字教材逐渐增多,经过历代的淘汰选择,去粗存精,我国古代集中识字的教材逐渐形成以“三、百、千”为核心的体系。“三、百、千”是我国古代流传、使用时间较为长久的识字教材,它包括:南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北宋无名氏编写的《百家姓》以及南宋王庆麟编写的《三字经》。从时间上看,《千字文》历时最久,但它只有 1000 字,显然不够用,而且这 1000 字没有重复,儿童即使能够全部背诵下来也不利于巩固复习。它与《三字经》、《百家姓》配合起来使用,从字种与字量方面看,有 2000 字且大多为古代常用汉字,都符合集中识字的基本要求。可以说学会了它们也就可以应付日常之应用。“三、百、千”形式短小,语言通俗,音韵和谐,便于背诵。配合使用,特点各异。儿童可以很快读完其中的一本,增强了学习兴趣。

古人在实际的识字教学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清人王筠将实物引入到汉字教学中,他认为识字应该“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教童子法》)清人崔学古在其所撰《幼训》中阐明了“纸上识字法”,即在纸片一面写上正字,在其背面写上该字的不同字体或同音字以供辨认,颇为类似于现在使用的“卡片识字法”。此外,民间的一些杂字书中出现了图文的相互对照,很像今天的“看图识字法”。

在识字教学过程也有意识地教授一些汉字的基本知识。王筠的《文字蒙求》精心挑选了 2044 个基本汉字,逐一介绍它们的构造方法、源流、字形、字体、字义,明白晓畅,收到非常显著的效果。为了帮助儿童提高辨别汉字正误的能力,清人龙启瑞编写了《字学举隅》一书。这本书分“辨讹”与“正讹”两部分:一方面将形体相近的组合起来加以辨析;另一方面也将易写错的字排列起来加以展示,使儿童印象深刻。《声律启蒙》则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属对知识。

另外,古人还编写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历史文化和名物常

识方面的课本。如：有关历史掌故的有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唐胡曾的《咏史诗》、明孝廷机的《五言鉴》、清鲍东里的《廿三史评口诀》以及各种朝代歌、历史人物歌和断代蒙求等。这些书籍的编写大多简洁明快，往往一句话就能概述了一段历史，其中多间杂作者的好恶倾向。有关名物常识的蒙学教材似乎更多，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清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以及杨臣诤的《龙文鞭影》影响较广。这类书大部分分门别类，林林总总，内容庞杂，可称作为古代的“少儿小百科全书”。

在识字教学的同时，古人也十分重视写字。清人陆钦仪认为“凡子弟写仿书，不独教字好，即可兼识字及记诵之功”（《论小学》），可见写字的作用已经被充分地认识。古人采取了认、写分开的策略，认字贵多，而写字则贵少而简单，从最基本的汉字写起。清人褚人获曾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坚瓠集》卷四）。先写这 24 个字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汉字基本笔画、部件、结构的书写练习。在具体的写字教学过程中，古人总结出了许多法则，例如，握笔时的“虚、圆、正、紧”四字诀^①，习字时必须遵循的描红、影写、临帖三大步骤等。

二、古代阅读教学

识字教学之后，开始进入正式的阅读教学阶段。古人认识到，从一开始就让七八岁的儿童生硬地记忆经典教条并不符合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在阅读教学的初级阶段应该选择一些简单的诗歌或散文故事。此类常见的教材一般是《神童诗》、《千家诗》、《书言故事》、《日记故事》等等。当儿童的阅读兴趣被调动起来之后，塾师就会根据实际的需要为学生选择一些其他方面的精读或泛读教材，以提高他们的阅读水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虽然古人用于阅

^① 清·崔学古：《少学》。

读教学的教材浩如烟海,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总的来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阅读教学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各种诗歌类教材,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之类。由于诗歌在古代士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如唐代还直接关系到读书人的科举命运,因此古代的诗歌阅读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现有的典籍看,孔子大概是我国古代重视诗歌阅读教育的第一人,例如,《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些内容表明,孔子不仅认识到诗歌具有培养一般认知和言语能力的功能,还注意到诗歌的艺术美感对于礼乐的最终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到了唐代,儿童从一开始接触语文教育,一般就必须阅读并学习写作诗歌,当时的塾师一般都要临时辑录一些浅显易诵的诗歌教材教与学生吟诵。

其次,古人阅读的第二大类教材主要是各种文选,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等,这些文选虽然在编选体例上各有不同,或者按照时代源流或者按照体裁风格选编成册,但它们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相似的。学生阅读了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章,一般都会对文章的写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例如,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极有影响的文选。这部书共收集了从周代到梁代以来七八百年间 100 多位作者的 700 多篇诗文作品,而且按照文章的体裁加以系统的分类编排,这种编排体例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历代以来的语文文选读本。《昭明文选》对当时的语文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文人都将它作为文章写作的样板。连后来的宋人谚语都说“《文选》烂,秀才半”^①,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我国古代学子阅读的第三大类教材通常都与科举考试

^①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各种写作训练指导、时文汇编等。

这三大类读物与经典文献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科举时代阅读教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一般说来,古人在整个阅读教学阶段都要以读经为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读的具体内容也有细微的差别。先秦时期,士人阅读的经典主要是孔子整理的部分古代文献典籍。孔子根据自己的政治伦理道德理想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并把它们当作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这套集文、史、哲等各种内容于一体的教材,是我国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被后人尊称为儒家“六经”,成为长期以来古人阅读的基本内容。到了汉代,人们对先秦时期的典籍作注释讲解。士子治经学往往都凭借这些注释来理解阅读,因此积累了不少阅读方面的学习经验。汉儒指导学生读经,一般都要经过断句、析字、正音、释义、章句等几方面的工作。所谓断句,即将一篇文章的章节、语句、各句之间的停顿进行点析划分;所谓析字,就是对该字的字型、构造法加以分析;所谓正音,即为该字注音,汉代常用该字简易的同音或近音字进行拟音,旁边标明“读如”、“读若”、“读为”等等,后代发明的反切法对此作了重大改进;所谓释义,指的是对该字或词进行义训。以上诸法可为生徒阅读文章扫清基本的语言障碍。所谓章句,一般是指经学家对于文章某段某节或某句的解释等等。由于汉代经学家学风朴实,注重考据,所以汉代的章句也比较注重分析阐发,这与后世的文章阅读方法是略有不同的。宋元以后,理学逐渐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为了推广这种理学教育思想,理学家朱熹重新编订了一系列经典阅读教材。他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且亲自作注,借以阐发自己的道德理想。这套朱熹版的《四书集注》后来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答案”,遂成为元仁宗以后历代士子必读的经典教材。朱熹在阅读经典的方法上也别有一番见解,现存的《朱子读书法》一书是其弟子详细记录朱熹谈论经典阅读教学方法的专著,它系统

地总结了朱熹的“读书六法”，即为后人所熟知的循序渐进法、熟读精思法、虚心涵咏法、切己体察法、著紧用力法、居敬持志法^①。从这些方法中我们可以略微看出朱熹经典阅读教学思想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朱熹要求学生的阅读范围应该限定在那些对个人的道德修养有帮助的书籍上，具体而言，主要是四书五经。

第二，朱熹认为阅读应该体现出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阅读四书应该在先，而《大学》又应该在《论语》和《孟子》之前阅读。具体到某一本书的阅读，他要求首先要弄懂字句，其次才能明了主旨。

第三，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明道，所谓的“熟读精思”、“虚心涵咏”无非就是要更好地掌握这种义理而已。

第四，他要求弟子在读书明道之后必须转而回到自身的修养上来，拿自己的言行与圣人之教化作比较，最终达到一言一行都合乎圣贤的标准。

在长期的阅读教学中，古人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古人认为读书首先要读好书，所谓好书不仅仅指那些文章内容优秀的书籍，也包括特定的版本和优良的印刷质量。在此基础上，古人对阅读数量的积累也很重视。根据古人的经验，十来岁的孩子至少应该能熟背 100 首以上的优秀诗歌和百来篇的优秀文章。如果想具备基本的写作能力，则至少要让他们熟读 200 篇的古文不可^②。有了这些诗文做底子，以后的语文教学就很容易展开了。在阅读教学的方法上，古人最重视朗读和诵读。在古人看来，十五岁以前的儿童正处在人生记忆力最好的阶段，如果这段时间不让他们去大量地背诵诗文那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此他们创

① 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②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4 页。

造了很多的诵读窍门。由于长期以来言文分离的事实,古人学习古文与我们今人一样缺少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所以古人主张大声地诵读这些文质兼美的诗文,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虚拟的语言学习氛围。当古人沉浸于这种文言环境之中,他们对于那些诗文的语感就会加强,也会在不知不觉间感悟到其中蕴涵的美感。古人在教学中也悟出了许多阅读格言,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等等即为这种经验的真实写照。虽然古人要求儿童对于规定的每一篇优秀诗文都要达到“熟如流水”的程度,但他们也不是一味主张稀里糊涂地乱背,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同样也要求学生能够多读多想,能够对文中的观点提出质疑。此外,古人还提出过读书时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这些经验对今天的语文阅读教学依然富有借鉴价值和意义。

三、古代语文写作教学

写作教学在整个古代语文教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衡量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科举时代它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古人对于写作教学极为重视。然而从实际的教学经验来看,古人也不并因为它的重要性而过早地进行写作训练。他们认识到刚刚发蒙的儿童对生活的观察、理解都很不够,掌握的语言材料也不足,所以在早期一般只进行一些简单的属对练习以增强儿童表达的能力和兴趣。从实际的教学效果看,这种属对训练不仅帮助儿童掌握了词类和语法的基本知识,也锻炼了他们遣词造句的能力。

在熟练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优秀文章之后,塾师就会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在诵读这些经典文章的同时,也能够体会文章的风格、体裁特点以及结构作法等,并以这些古人的文章为蓝本进行模拟练习,这样初学写作者就很容易入门了。一些塾师也能够亲自动手作“下水作文”,即教师出题,教师与学生同题作文,教师自我讲解。

这样做既可使学生很容易地掌握作文的基本方法规则,也可消除学生害怕写作的畏难心理,其优点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初学者往往要熟悉各种类型的文章体裁,所以大量的写作练习是必不可少的。古人特别强调多写多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求学生初学写作时广泛涉猎各种体裁风格的文章,争取进行各种尝试,使之能成为一个写作多面手;另一方面要求学生能同题多作,即对同一题目的文章进行反作、顺作、逆作、明作、暗作等。

当学生对这些文章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都熟练掌握以后,写作练习一般会进入到更为复杂的写作阶段,即让学生跳出原先所拟定的各种文章框架开始独立写作。根据古人的教学经验,学生要想成功地进入这一阶段,必须经历一个“先放后收”的过程。所谓先放后收,就是指在初学阶段应该鼓励学生大胆写作,无所顾忌,力争在文章中能够表现自我,等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逐渐要求学生注意文章的结构精练和语言规范等。宋人谢枋得曾将这种过程命名为从写“放胆文”到写“小心文”的过程,他在《文章轨范》中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如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

文章写完之后,还要有一个修改的过程。古人对于文章的修改同样也是十分重视的。宋人王日休在总结塾师的文章修改经验时说:“若改小儿文字,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其才思。”、“直待作得十分是了,方可尽改作十分。”(《训蒙法》)可见教师的批改也是因人因时而异,当学生处于初学写作时,教师应该以保护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为主,尽量少改,即便改动也应简明扼要,多作鼓励。当学生的写作水平上升之后,教师的要求也应该随之上升。此外,古人也十分重视学生的自我修改。学生的自改通常会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学生能在写作过程中对文中个别的字词语句反复锤炼,以此养成谨严朴实的写作态度;二是要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能不断反省自己以前作文中所存在的缺陷,不断修改过去的文章对提高学生现有的写作水平也很有帮助。在修改方法

上,除了通常的教师批改之外,古人也提倡学生间应互相批改或学习别人如何修改。

古人对写作教学如此重视,目的就是要学生能够最终写出“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题旨要明通、笔气要清顺”(《教子良规》)的好文章出来,借以科场夺魁,所以古人的写作教学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的。明清实行八股取士,写作教学同样也陷入到了程式化的死胡同当中。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出于专制的需要,很少允许考生在文章中借题发挥,同时为了“公平”起见也迫切需要制定一种形式严格便于裁判的标准文体,于是八股文应运而生。所谓八股文,也称四书文或制艺。八股文的结构按照起、承、转、合来完成,一正一反,一虚一实,此起彼伏,此平彼仄。单从文体上看,八股文层次清晰,结构严谨,里面确实蕴涵了文章写作的很多规律。周作人认为,八股文“不但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①。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不仅形式要求死板,连文章的字数也规定得极为严格。更为严重的是,作者在文中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要“代圣人立言”,力求“无一字无来处”,以致使其完全成为一种毫无实用价值的“敲门砖”。读书人要想写好八股文常常要在属对、声律、句读、辞赋上花费大量精力,同时又必须熟记四书五经。于是人们应付八股文写作的“诀窍”也层出不穷,对整个明清时期的写作教学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晌。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历史悠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弊端。张志公先生曾提出传统语文教育存在“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不重视知识教学”四大弊端^②,实际上可能还不止如此。我们研究古代的语文教学,不仅

^① 唐 :《文章修养》,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 页。

^② 张志公:《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见《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